

# 访钱宁教授

陈 灵 若

最近，我到清华园访问了钱宁教授。

那一天，乍起的北风夹着西伯利亚的寒气，不时袭人发肤。我气喘吁吁走到他的寓所，连声叩门，不闻主人回音。真令人懊丧，这位教授到哪里去了呢？我信步向水利系教学楼走去。途中一位同志告诉我：“钱老师正在给学生做报告”。

我疾步奔向大礼堂。报告人那浑圆而响亮的声音，顿时通过麦克风传到我的耳鼓。这可是钱老师吗？两年前的严冬，在首都医院病榻上的情景，立即在我眼前闪过。我进入礼堂，向前望去，果真是钱宁教授坐在讲台上，向青年们讲话。

我向身旁一位女同志打问，才知报告已开始一个多小时了。讲话内容是：我为什么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校的预备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来听讲。由于参加的人十分踊跃，礼堂旁的阶梯大教室也拉了线。

钱宁讲起话来条理分明。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自己对党的认识，还讲了有关党风等问题。他讲到那天夜晚，他从清华园里爆发出来的欢呼声中——庆祝中国足球队战胜科威特足球队，看到同学们那种爱国热忱和民族自豪感。四十年代他作为一名青年留学生在美国，多么希望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的祖国早日成为东亚健夫啊！而现在这个愿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话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的中国多么可爱啊！我们的青年多么可爱啊！”最后他说：同学们提出“为四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非常之好。振兴中华，人人有责。振兴中华要由每个人做起。

报告结束，一起回到了他的寓所。他对我久等很过意不去，而我却认为此来采访意外遇上这个机会，收获很大。他告诉我，他身体很好，每天早晨坚持两小时锻炼，上、下午都工作。不久前，他到瑞典、西德、比利时三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并在斯德哥

尔摩参加了世界大坝会议的预备会。1982年5月，国际大坝会议将在巴西举行。他正忙于起草这个会议的学术报告。我国大坝数量之多，居世界之最，而且在解决水库泥沙淤积方面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被确定为《水库淤积和塌岸》这个专题的总报告人。

我最为关心的是他那泥沙理论著作《泥沙运动力学》进展的情况。1979年他生病时，全书17章只完成10章。那后7章的份量不轻啊！这次得知，此书不仅全部完稿，而且已经审定，送交科学出版社付印了。

我为这一消息振奋了。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的结晶啊！五十年代初期他从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取博士学位不久，清华大学向他发来聘书，请他回国任教。从那时起他开始做回国准备，日夜搜集资料，赶写《泥沙运动力学》讲义稿。十年内乱中，他从牛棚



钱宁教授近影

刘文敏摄

到干校，从干校到山西，他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三本厚厚的讲稿。有幸在四次抄家中，竟无一人赏识它。钱宁重返清华园后，继续整理书稿。为了写这部书，有谁知道他付出多少心血，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我记得，从武汉到三峡途中，在“东方红”江轮上，曾见到他的座舱窗口，深夜灯光还在闪亮；在距黄河花园口不远的会议驻地，见他夜晚带病伏案疾书……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他献给泥沙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食粮，毋宁说是他献给祖国泥沙事业的一颗忠贞不渝的心。

为了祖国，钱宁教授在五十年代毅然回国。他坚决舍弃了他当时在美国所能得到的一切，包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经过努力攻取的博士学位，以及他同他的导师小爱因斯坦在泥沙科研领域里所享有的盛誉，等等。尽管“文化大革命”中他蒙受了屈辱，然而，他始终对祖国充满了热爱。1978年，他从三门峡回到北京之后，迈开大步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钱宁向我介绍说，新建的清华泥沙试验室，

已经基本建成了。这个试验室面积达3800平方米，比清华现在的礼堂面积还要大呢！为国内有关单位培训泥沙科技人材的训练班，已举办了一期。有关国际组织还决定在中国筹建国际泥沙研究和培训中心。关于黄河泥沙的治理，他认为关键是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治理好中游的主要支流。他在两年前提出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最近，张瑞瑾等9名水利专家又同他联名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建议加速治黄工作，并提出了根治黄河的意见。

临别时，我向他说明此来是应《中国水利》编辑部之约，想向关心钱宁教授的许多读者，提供一篇有关他个人近况的报道。她的夫人龚维瑶同志——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请你千万不要报道他了，他承受不了。更何况他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尚未经受党的严峻考验……。”钱宁教授补充说：“报道一个人不好，许多工作都是大家干的。水利界许多同志的工作比我做得好……。”我完全相信，这是出自他们的肺腑之言。